

日本汉学家島田虔次： 耕耘中国文化研究与中日文化交流

□ 马明冲

宋儒张载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虽然观点不一，但理想追求却一脉相承。在日本汉学界，《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此“近代”实为“近世”之意，指宋、元、明、清）一书以宽广的视野生动诠释了先贤们这一理想追求，再现了具有活泼气息的中国思想史，是二战后日本研究中国思想的优秀著作。作者島田虔次是日本著名中国思想史学家、二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自1941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的近60年间，島田虔次就一直辛勤耕耘在中国学术文化研究领域，尤其醉心于中国儒学，为促进中日两国思想史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年少立志，自居“读者”

1917年，島田虔次于广岛县三次市出生，毕业于京都大学，先后任职于长野县立野泽高等女子学校、东海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单位，被授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称号。

1941年从京都大学毕业时，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围绕阳明学展开的，题目为《阳明学的人的概念、自我意识的展开及其意义》。文中重点阐述“人”的概念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吾”的视角，将其置于社会之中，动态鲜明地呈现了从王阳明到李贽的思想史演变。他运用重“内”轻“外”、“内”“外”互动的理路来论述中国“近代思维”的产生。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该理路也充分体现在他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等成果当中。

島田虔次自青年时代就痴迷于汉学文化，立志成为一名终身“读者”。本科毕业后，他成为长野县立野泽高等女子学校教员，1943年，入职东方

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担任助手一职。工作后，島田虔次并未放弃他持续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理想抱负和读书治学的志向。1945年，島田虔次在阅读《历史和自然科学：关于道德的起源》一书时曾留下批注：“即使一生以‘读者’终老，又有何可遗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島田虔次成为东海大学预科教授。1949年，赴京都大学担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助理教授。同年，出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一书，此书奠定了島田虔次在日本汉学界不可动摇之地位，是战后日本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在该书自序中，島田虔次曾表示：“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对黄氏的关心毫无衰减，我相信我把他的文章差不多都看完了。”可见，他对于中国思想史的“迷恋”程度。在看过稽文甫的《王学左派》之后，島田虔次逐渐对泰州学派产生了浓厚兴趣。

治学严谨，真知灼见

島田虔次是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在中国学术思想研究问题上有

着真知灼见。

在学术观点上，島田虔次认为中国社会自宋明之后，就逐渐产生“现代”的萌芽。同时，他还着重分析了“万物一体之仁”的观点，认为“其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决不是特意图之而然，而只是其心之仁本来就是那样的缘故”。因此，在島田虔次看来，阳明学的出现是一场和西方文艺复兴思想具有同等地位的东方启蒙运动，这一观点也有有力地驳斥了“亚洲停滞论”的说法。虽然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受到大地主阶级的层层阻挠，但并不是像有的史学家所认为的——中国思想处于古代文明社会之中一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島田虔次在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从朱子学到阳明学的发展历程，勾勒出了阳明学和清代考证学之间的关系，强调中国思想在深层上是连续的，是缓慢向前发展的。他指出，“明清的非连续性，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不抓住在其本质上所存在的、具有深刻连续性的基础构造，那么，要想统一地把握近世的中国，归根结底是不可能的”。

在学术立场上，島田虔次对中国学术思想及其厚重的历史积淀充满敬佩之情，坚决反对全盘否定中国思想

的言论，认为阳明学是实践性的哲学，人亦是实践中的人。島田虔次认为，对于中国儒学的研究不能局限在概念的推演上，要深入把握心学的核心、根本动力、实践主体等实质问题。应从历史的连贯性出发，结合东方社会的实际进行研究。此外，他还强烈反对用带有西方色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评判东方思想，认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东方社会，虽然要将中国放在世界史特别是思想发展史当中来进行考察，但要主动跳出西方评价框架去看待中国近代思想史。他始终认为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意识才是中国哲学思索的基盘，“人由于唯独把‘内’‘良知’作为问题，反倒开辟了对于外的知识、技能等的积极评价之道”。尤其是在讨论佛教与宋学之间的关系时，他指出，虽然佛教对宋学产生了影响，但宋学并不是佛教的“翻版”，只有将思想嵌入中国宏观社会发展中，才能有准确的理解。

在研究方法上，他注重资料收集，特别讲究对中国原著的解读。島田虔次治学严谨、谦逊，他曾自嘲其早期文章是“难为情的文章”。他认为，只有熟悉中国语才能研究好中国史，撰写文章时要建立在严谨的考证

基础之上，通过引用大量目录、批注等形式，引经据典，从而才能形成对自身观点的支撑。在分析观点时，島田虔次较少从当时的背景入手，而是强调对思想主体的深入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基本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兼顾和统一，从而避免了脱离实际的学究式研究。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島田虔次始终致力于传播中华文明，倡导中日友好。1960年、1973年，島田虔次曾两次作为日本访华团成员访问中国，与中国学术界建立了友好交流。1974年，他前往巴黎专门学习海外汉学界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在长达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島田虔次著作等身。回顾島田虔次的一生，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一直笔耕不辍，除了代表作《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朱子学与阳明学》之外，他还先后参与了《亚洲历史事典》《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研究》《思想的历史第六卷》《世界文学小辞典》《岩波讲座——世界历史》《清末民初政治评论集》等著作的撰写工作。《中

国思想史的研究》是島田虔次逝世两年后，由其学生根据他生前的意愿而整理出版的。

一世勤学，一生育人，桃李满天下。自1977年起，島田虔次在京都大学开设“明末的思想与社会”“刘师培思想”等课程，使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华文明，为中日友好往来营造了良好氛围。在《悼念島田虔次先生》一文中，森纪子回忆道：“先生带来的书籍原本该用来介绍史料的，可是突然被书中的某段记述吸引住了。于是，将讲了一半的课程丢到一边，津津有味地朗读起来。话题可以从清末知识分子讲到俄国知识分子，还可以延伸到其他许多方面。”“用废旧纸切成的细长纸条，在半截信封外探头探脑，不用说就知道这是作为书签使用的。有好多本绿色硬封面的薄本子，叠成一堆，其中就记录着先生和我们闲谈时，那一个有趣味浓厚、耐人寻味的学术问题。”由此可见，他的课堂氛围独具特色，形成了对学生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島田流派作风”。

2000年，島田虔次去世后，其藏书分别捐赠至日本京都大学、韩国东国大学、中国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他的学生狭间直树等继承其遗志，投身到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之中。回顾其一生，島田虔次真正达到了《传习录》中所说的“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之境界，他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鞠躬尽瘁，通过与先贤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中日文化与学术交流搭建了桥梁，从而让更多的人去读懂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



中英街的历史变迁

□ 姜永烛



“日出沙头，月悬海角”，广东省深圳市的沙头角镇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美丽富足的港湾，是客家人世代安居乐业的家园。沙头角在19世纪初人口发展到了7000人规模，其中禾坑、南涌、担水坑、山嘴、莲麻坑和盐田都是沙头角的富裕村落，经济活动频繁。在沙头角，有一条长约250米、宽约4米的古街。它曾经是“鹭鸶径”，后来被迫变成了“中英街”；它走过了外强侵占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它是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的浓缩，更是一本勿忘历史、发愤图强的教科书。

1898年，中英双方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行向清政府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九龙半岛北部土地及附近230多个岛屿，这些地方自此被统称为“新界”，租期99年。1899年，中英两国的勘界人员来到沙头角，在一条干涸河道上设立界碑，界碑东侧区域称为“华界沙头角”，界碑西侧区域称为“英（港）界沙头角”。

冰冷的界碑阻断了探亲祭祖的路，却磨灭不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信念。1899年4月，英军要在新界举行升英国国旗仪式，为了不让英国的国旗插在中国的土地上，当地居民顽强抵抗了六天六夜，最终遭到了英军的残酷镇压。英国史学家派屈克·哈泽对这场战斗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伍星耀、邓惠麟等抗英义士更是用“省墓难通泪更流”“宋代来居八百秋，岂知乐土反成愁”“生能抗敌非文弱，死不惊人岂丈夫”“五马有刑惩汉歹，九龙无界限夷夷”等诗句抒发他们对失去家园的悲痛和对抗争到底的坚定信念。

然而中英街的形成仅仅是沙头角镇苦难的开始。1938年底，日军攻占

广州，使香港成为孤岛；1939年，海南岛沦陷，香港进一步被孤立。1940年6月，日军华南方面军发动广九作战，占领深圳。面对步步紧逼的日本，英美却妄想继续推行远东绥靖政策以换取一时苟安。1940年6月27日，美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向美国提议：美日英三国协商，割让部分中国利益，让日本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只要日本接受，英国还可以为日本提供侵华物资援助。随后，英国同意日本的要求，关闭滇缅公路，致使中国抗战急需物资无法运入。1941年12月18日，日军踏过中英街登陆香港；12月25日，时任港督杨慕琦宣布投降。英国人离开，日本人占领，开启了香港历史上为期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1942年起，蒋介石政府多次尝试通过谈判收复香港，遭到英国的强硬拒绝。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东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政府一边连续声明表示无意以武力方式收回香港，一边企图通过美国的干涉实现香港回归。然而没有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外交手段是虚弱无力的，日本投降十五日后，英国完全无视蒋介石政府的声明，派遣海军少将夏惠率皇家海军特遣舰队驶入维多利亚港，直接由日本降军手中接收了香港。日占时期，日军丢弃了中英街上的三至七号界碑，1948年英军又寻回并重新立起这些界碑。

新中国成立之初，广东省政府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设立了边境管理规定，中英街并非正式口岸，仍需参照政治边防和军事边防政策管理；在另一边，港英政府则将“新界沙头角”设为边防禁区，实行“宵禁”。20世纪80年代初，深圳一侧的中英街凭借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和免税低税的政策优势，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游客，赢得了“购物天堂”的美誉；根据1988年中英街上的店铺数据统计，仅黄金饰品的销售额就高达15.7亿元。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更是有大量游客来到中英街，希望一睹“东方明珠”的风采。当时，街上店铺已多达200多家，日营业额平均百万元以上，最高时达400多万元。

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中英街仍继续沿用“一街两制”管理办法：内地居民需要办理通行证才能进入深圳一侧的中英街，香港一侧则维持了禁区状态，居民需凭“禁区纸”方可进入。随着内地经济的飞速发展和香港自由行的开通，中英街也在不断探索转型之路。2014年12月，经深圳市编委批复、区编委发文，中英街管理局成立，并于2015年1月正式揭牌运作。作为盐田区人民政府派出机构，中英街管理局对中英街辖区（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实行综合治理，负责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文明、城市管理等各项事务。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完善了国检、海关、边防等各部門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并建立了与香港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实现了“条块管理，以块为主”的管理机制，激发了更多活力，中英街也以“特区中的特区”这一崭新的形象成为大湾区的新亮点。

在中英街4号界碑旁，矗立着一棵枝繁叶茂的百年榕树。它扎根于东沙头角，枝叶越过界碑，伸向香港，因为“根在祖国，荫泽香港”的寓意而深受当地人的喜爱。百年来的“一街分治”从未改变乡民“同走一条街，共饮一井水”的同根同源情谊。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以及深港合作的持续推进，中英街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特区政府于2021年10月发布了《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此策略的编

制从空间观念和策略思维上跨越了深港两地行政界线，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创新。《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提出了建设“双城（香港和深圳）和三圈（深圳湾优质发展圈、深港紧密互动圈和大鹏湾、印洲塘生态康乐旅游圈）”的新构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逐步开放沙头角码头作旅游活动，为活化印洲塘一带的传统村落增添活力，并为长远开放沙头角所需配套作准备”。2022年6月，香港沙头角码头正式对外开放，“禁区纸”规定被取消，封闭了71年之久的沙头角禁区终于迎来了开放的第一步。为全力配合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2022年8月，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发布《加快沙头角深港国际旅游消费合作区建设的实施方案（2022—2025年）》，提出30项重点工作任务，将合作区打造成为国际跨境旅游首选目的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特色引领区、深港共建共治融合发展新典范。百年前被割裂的沙头角东西两侧地区如今正在携手创造新的辉煌。

“一街之兴衰，关乎国势；百年之荣辱，窥于一斑。”为了牢记历史，盐田区人民政府在一号界碑东侧修建了一座专题性地方志博物馆——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的外墙写有这样一句话：让历史告诉未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英街必将从暗淡的历史走向光明的未来。



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1989——1991...

□ 左凤荣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两国领导人的这次会见，标志着中苏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

在此之前的几年，中苏两国关系已经在向实现正常化演进。1982年10月，中苏副外长级政府特使在北京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希望为苏联国内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1986年3月，苏共二十七大通过的决议表示，“苏联同伟大的邻邦——社会主义中国的相互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尽管在对待一些国际问题的态度上还存在差别，但是在平等和不涉及第三国的基础上发展合作是可能的”。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

